

文教風雲人物誌（四）

我所認識的錢穆和臺靜農

● 劉真（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）

錢穆學究天人

自學成功典範學人

國學大師錢穆，字賓四，江蘇無錫人。西元一八九五年（清光緒廿一年）生，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，病逝於臺北，享年九十六歲。錢穆先入中英中學肄業，後又入長洲中學讀書，究竟中學有沒有畢業，我不太清楚，不過，他是當代中國自學成功的一位典範。

一九一二年，錢穆十七歲，在家鄉無錫一所小學裏教書。十一年後，二十八歲時，任廈門「集美師範」國文教師，後又回無錫，在江蘇第三師範和蘇州中學任教。一九三〇年，發表「劉向、歆父子年譜」於燕京學報上，震動學術界。顧頡剛是

錢穆的中學同學，當時正任燕京大學教授，所以他將錢穆的文章介紹發表在燕京學報上。錢穆的這篇文章，大膽地駁斥康有為的「新學偽經考」。同年秋，經由顧頡剛之推薦，任燕京大學國文系講師。一九三一年，轉任北京大學史學系副教授，後又升教授，並兼任清華大學、北京師範大學講席。在北大講授中國通史時，甚受學生歡迎。抗戰爆發後，隨北大南遷，先後在昆明西南聯大、嘉定武漢大學、貴州遵義浙江大學等校授課講學。

錢穆著作豐富，早期有「先秦諸子繫年」、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」、「國史大綱」等；尤其國史大綱一書，以溫情與敬意追述中國歷史，激發對本國歷史的重視與民族自信心，肯定先民對國家民族的貢獻。與當時疑古派的顧頡剛、錢玄同等

人，觀點大有不同。錢穆與顧頡剛是多年的至交，兩人雖在學術上見解迥異，但並不影響彼此的友誼，這點很令人佩服。

我與錢穆在大陸並不認識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，獲知他在香港，於是就寫信聘請他來師範院講課。十二月六日晚，他第一次在師範學院講演「文化學大意」，大禮堂內座無虛席，張其昀部長及若干文教界人士亦前來聽講，可謂盛況空前。第二天的中央日報，對此有詳細的報導。

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之間，錢穆為新亞書院籌集經費，常往來於臺、港兩地。有一次，應「大陸雜誌社」（朱家驊創辦，田培林為實際負責人）之請，在博愛路淡江英專的驚聲堂（即今日警備總司令部對面的博愛賓館舊址）講演，不意講演開始未久，屋頂突然倒塌，主席田培林

及錢穆都被壓傷，旋即送往廣州街的中心診所由張先林醫師醫治，我聞悉後便和師大的幾位學生前往探視。

錢父以一個字戒驕

有一次我和他閒談往事，錢穆回憶他的中學教師呂思勉（北師大畢業，著有白話本國史等書）上課時走來走去的情形，我當即告訴他，我在大學時，也聽過呂思

勉教授的課，他笑謂我們兩人還有「同門」之誼。錢穆每次回國，我們兩人經常在忠孝路勵志社（現中央日報舊址）對面的北方小館吃飯。有時徐復觀、李天民等人也常來聚談。錢穆說他小時候喜歡看章回小說，並曾在茶館裏向茶客講述三國演義、水滸傳等，講後獲得聽眾叫好，頗為得意。有一次他向他的父親提及此事。他的父親提出一個「橋」字，問他怎麼寫，他說是喬從木，父親又問他把「木」字邊換成「馬」是什麼？他說是驕。父親就告誡他為人不可以驕傲。錢穆說他一生都受父親這一句話的影響。也正由於少年時有說書的經驗，所以後來在學校講課，頗能運用「說故事」的技術，表情達意，抓住學生的情緒。據一位曾在北大聽他講課的學

生說錢先生講起課來聲色俱佳，可是卻也累得滿頭大汗。他常說做老師的人對學生要有一份「尊敬」之意，因為這就是一種「身教」，可使學生了解人與人之間應該相互尊敬的道理。

一九六七年，錢穆自香港返國定居，初寓臺北市麗水街，我去看他並告訴他將往韓國訪問，他說他正著手撰寫「朱子新學案」，聽說韓國人非常崇敬朱熹，有關朱熹的資料很多，希望能替他搜集一點。

我回國後，又去看他，並表示要請他到政大教育研究所講授「中國傳統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」，他最初不肯，他說已在報上公開表示來臺後專心著述，不再去大學教書，可是經我再三懇商，他始應允講一個學期，每次講課時，均由我親自接送。他破例到政大講課，外間頗多不解。聯合報的記者于衡在「臺北外記」的專欄中，還寫了一篇「劉真禮賢下士」的文章，記述錢穆為何去政大授課的緣由。

我在師院任職期間，接到錢穆自港來函，提及新亞書院的一名女生胡美琦，因家在臺北市，希望能轉學師院教育系就讀。後來經過轉學考試，胡生成績極佳，就在師院肄業。胡生畢業後，我又接到錢穆

來信，表示要聘胡為新亞書院助教，我也回函同意。以後她與錢穆結婚，因兩人具有師生關係而年齡相差過大，一度曾引起一些人的批評，不過我卻認為婚姻係兩個人之間的事，只要是合法的，外人無庸表示意見。他們兩人結婚二十餘年，生活非常美滿，如果錢穆晚年沒有其夫人胡美琦的妥善照護，也許不會享此高壽，和寫很多傳世的著作。

復興儒學表率士林

他在政大講課後，張其昀便以文化大學創辦人的身分，聘請他在文化大學授課，他也無法拒絕，於是每週便在外雙溪素書樓住處講課。一九九〇年（民國七十九年）因受到臺北市議員的質詢，憤而離開他住了二十多年的素書樓，搬到杭州南路的一所國民住宅內，不久就抑鬱以終，士林為之浩嘆。錢穆公祭時，我寫了一幅輓聯：

「儒學賴復興，是中流砥柱，表率士林，立德立言垂不朽；斗山久共仰，念一代宗師，永留教澤，愛國愛人足千秋。」藉以表達我的敬意與哀思。他的夫人胡美琦所寫的輓聯，則是：

「塵世無常，性命終將老去；天道好還，人文幸得綿延。」夫妻間互相敬愛之情，表露無遺。錢穆一生矢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，反對共產主義，更不惜與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者筆戰，遭受到若干人士的誤解。不過他在學術方面的成就，則是為大家所肯定的。

錢穆在大陸期間，一直講學著書，從未擔任行政工作。一九四八年避難香港時，始與幾位文化界志同道合的人創辦新亞書院，他志在把中國古代書院精神融入現代的大學以內。

其後又和美國耶魯大學（舊稱雅禮大學）合作，並得美國亞洲基金會、洛克斐勒基金會、哈佛燕京社、英國文協會、香港政府、香港孟氏基金會等機構贊助。

其間他曾至耶魯大學講課，獲得耶大榮譽博士學位。他把新亞書院辦得有聲有色，成績斐然。及至後來新亞書院與崇基書院、聯合書院，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，錢穆才辭去新亞職務，在東南亞一帶講學，一九六七年終於離港來臺長住。

錢穆所著「國史大綱」，肯定中華文化，振奮民族精神，銷行既廣，影響自大，他在書中所寫的一篇「引論」，揭示兩

點要義：「一、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，明白示人，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須之知識。二、於舊史統貫中，映照出現今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。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，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，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徵候，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。」鑑往知來，希望對新中國的建設，能有啟導的積極意義。

向高級軍官講史學

錢穆於一九五一年，應國防部的邀請，對當時的高級軍官，做了一系列的講演，後輯為「中國歷史精神」出版。講演共分七次：首講「史學精神和史學方法」，末講「中國歷史上的道德精神」，中間五講，分就中國歷史上的政治、經濟、國防、教育、史地與人物，加以析述。在「前言」中，他自述是一失學孤兒，因讀到梁任公的「中國不亡論」，半信半疑，為了求證，乃發憤讀史。他說：「今天我對中國歷史的看法，在我自己，已像宗教般的

願講出我知道的一切。」所以這次講演，不但講出了他的知識，也注入了他的感情，可與德國菲希特的「告德意志國民書」媲美，對中華民族的復興，有振聾啟聵的作用。

錢穆精研史學，構成一種以史學為中心的學術系統。他在「人文教育十二講」中（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編，三民書局印行），以「中國民族性與中國文化之特長處」為題，說：「：故中國史學，實乃一種超出尋常的人生哲學，亦是一種超出尋常的人生科學。一切學問盡包在史學之內，而史學乃超乎一切學問之上。要明白中國孔孟學說，要明白中國民族文化，不得不先通中國史學。」

對中國文化有貢獻的，孔子以後，當推朱熹。錢穆的「朱子新學案」，應是這方面的代表作。「朱子新學案」成書於一九七一年，當時錢穆七十六歲，可謂晚年巨構。此書共一百五十餘萬字，費六年之力完成，仿國史大綱之例，前有長篇「提綱」，約十三萬多字，亦單獨發行，顏曰「朱子學提綱」。出書前他親自校對一次，時當眼疾手術之後，兼以其他疾病，故

速度較為緩慢。例言末段說：「以日校萬字為度，體力不任，血壓時高。校稿垂畢，十二指腸潰瘍舊病復發。既以學殖之荒劣，重增衰邁之遽至，所能發明前人精意偉業，實恐有限。惟既竭吾心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私所嚮慕，時加讚嘆，則情見乎辭，未敢掩匿。讀吾書者，幸其諒之。」

朱子學案經典之作

朱子的「四書集注」，是一本對世人影響最大的經典之作，更被作為私塾和學校啟蒙的基本教材。不但正文大家都讀得滾瓜爛熟，就連注釋，也多能記誦。惟錢穆的「朱子新學案」，仍本理學綱領，先論「理氣」，由無極、太極、陰陽、鬼神，以至天人；然後論「仁」，聖賢、天人欲、心、性、命、數等，大致是由宇宙講到人生。而論仁則分上下兩篇，先言宇宙之仁，再言人生之仁，其實密不可分，可謂綜合宇宙與人生，以明天人合一的道理。

報載他最後一次至香港講學時，一日晨起，突然向其夫人胡美琦女士談及對天人合一問題，又有一番新的領悟，新的發

現，喜形於色，樂不可支，古人所言「學究天人」，錢穆一生可謂念茲在茲，老而彌篤了。

臺靜農能文善書

組未名社譯介作品

文學家臺靜農，安徽霍丘葉家集人，一九〇二年（清光緒廿八年）十月生，一九九〇年十月九日，病逝於臺大醫院，享年八十九歲，其夫人余韻閒女士於一九八五年逝世。臺靜農幼秉庭訓，讀經史，習書法，與同鄉張目寒（曾任監察院秘書長）、韋素園、李霽野、韋叢蕪皆為小學同學。小學畢業後，遠赴漢口中學就讀，這是因為他父親堅持的緣故。他與同學創辦「新淮潮」雜誌，鼓吹新文化運動。

一九二二年，臺靜農赴北京，入北京大學國文門旁聽，當時北京大學有個不成文的規定，凡是未入學者均可自由旁聽，也可申請入研究所就讀，並不一定需要有大學文憑。臺靜農後來申請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肄業，同學有董作賓等人。一九二四年，應北大歌謠研究會之請（主持人為常惠，該會負責收集各地民謠），編

有淮南民歌集。一九二五年春，經由張目寒之介紹，結識魯迅。同年八月，李霽野、韋素園、韋叢蕪、曹靖華等人組織「未名社」，從事文學創作與外國文學作品翻譯工作。曹靖華通曉俄文，所以翻譯俄國文學作品；李霽野擅長英文，就負責英文文學作品的翻譯，臺靜農則從事文學創作，早期作品有「地之子」、「建塔者」、「關於魯迅及其著作」。一九二七年夏，任北京中法大學講師。翌年，轉任輔大國文系專任講師，講授現代文學，不久即升任副教授，並兼陳垣校長的秘書。一九三三年，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文史系國文組副教授。一九三五年秋，經由胡適介紹，任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，講授文字聲韻學。一九三六年，北上青島山東大學任教，講授中國文學史及歷代文選，同事有舒慶春（老舍）。

出版散文龍坡雜文

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戰起，舉家遷往四川，最初是住在江津白沙鎮，任職於國立編譯館。當時因為對日抗戰，許多教授都到了四川，政府為了讓這些教授有安身之處，特約請他們到國立編譯館任職，實際

上並沒有什麼工作，只是發給他們一點薪水維持基本生活。一九四〇年，教育部在白沙鎮設立國立女子師範學院，師院聘臺靜農為教授。

一九四六年，臺靜農應臺大之聘，任中文系教授。一九四八年八月，兼任系主任，一直做了二十年，對臺大中文系建樹頗多。一九七三年夏，自臺大退休，校方贈予臺大榮譽教授頭銜。他生活一直不很寬裕，所以才到輔大、東吳任教。一九八三年起，不再教書，專以讀書、寫作自娛。一九八八年出版散文集「龍坡雜文」。翌年，收集歷年學術論文二十五篇為「靜農論文集」，得到金鼎獎。臺靜農不喜歡出書，多半都是學生為他出版的。他最喜歡書法，能變化創新，自成一家。一九八五年，出版「靜農書藝集」，備受海內外人士稱賞。繪畫方面最喜畫梅花。

我和臺靜農結交是來臺以後的事，我到溫州街龍坡里臺大教授宿舍去看他，相談之下，才知道他的故鄉葉家集，距我的家鄉劉家樓才九十華里，是小同鄉，均屬皖省阜陽第三師範學區。大家都鄉音未改，一見如故，以後也就常有往來。有時我在家中宴請文教界人士，也都會請臺靜農

來作陪。更常和幾位同鄉楊亮功、張佛干等人，一同到小館子餐敘。每年春節，我一定去他家賀年，他喜歡抽煙、喝高粱酒，所以我多以煙、酒、水果為禮。

有人索書來者不拒

他的性格狷介，但待人非常寬厚，凡請他寫字者，無論識與不識，很少拒絕。茶餘飯後，他每每揮筆書贈，有一次還笑談，將來收集他的作品最多的，恐怕非我莫屬。日月潭教師會館活動中心落成，教育廳陳倬民廳長命名為「白如樓」，孔德成和臺靜農寫了對聯送給日月潭的教師會館，掛在「白如樓」內。他不但字寫得好，金石篆刻也不錯。我和裕清結婚時，駐日大使許世英為我們證婚人，曾送了二方刻有「清白堂」與「清白世家藏書」的印章給我們作賀儀。抗戰期間，播遷各地，這兩顆印章就遺失了，我一直深覺可惜。一九七六年，有友人送兩方非常好的印石給我，我就請臺靜農照原文篆刻，刻得非常好，彌補了我們內心的遺憾，而且這兩顆印章出自臺靜農之手，除了代表友情紀念之外，更具收藏的價值。像溥心畬寫的「日月潭教師會館碑」未落印之事，也是

由臺靜農替他寫題箋釋文。臺靜農之重友誼，於此可見。他和張大千也是好友，張大千住所前面門口的字，也是出自他的手筆。

由於他在大陸時與魯迅過從甚密，有人懷疑他思想激進。在「未名社」解散之後，他放棄新文學，而專事於古典文學的研究。很多學術界人士，在其年輕時，往往思想偏激，但隨著年齡的增長，又慢慢有所轉變。像陳獨秀，晚年也出版他的「最後見解」一書，嚴正的批評共產黨。俞大維常說自己幼年時讀線裝書，青年時讀洋裝（文）書，晚年又重讀線裝書，臺靜農亦復如此。他來臺以後，絕口不談魯迅與新文藝，以免受到無謂的干擾，不過內心卻很鬱悶。他有一子二女旅居美國，可是他本人卻不易出境赴美探親。我遂向有關方面代為解釋，後來臺靜農終能赴美。探親後回臺，他來看我，大家彼此心照不宣。

他去世之後，很多人寫文章紀念，可見他在學術上的成就被大家所肯定的。我在臺所認識的學術界人士，像臺靜農這樣淡泊明志，不拘小節的人實在不多。